

陆地边境虚空化的“抵边村落”观察

——以云南省 H 边境县某“抵边村落”为个案¹

王江成

（云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陆地边境虚空化是边境生态中突显的动态过程，它随着边民的特殊外流或流失而表现为一种虚空的状态，给边境地区的人口安全、领土主权安全、边防稳固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带来了潜在隐患。“抵边村落”是陆地边境虚空化的重点区域，固守土护边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抵边村落”虚空化在边境虚空化进程中日益凸显。包括“抵边村落”虚空化在内的陆地边境虚空化有着特定的生发逻辑：现代化、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边境县域基层政府的治理环境及治理过程、边境场域的社会结构与邻国生态等共同导致了这一问题的产生。因此，边境虚空化需要国家、政府、社会、边民等力量持续关注并共同谋划解决。

【关键词】：陆地边境；边境治理；边境虚空化；边疆治理；“抵边村落”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8）04-0059-08

边境虚空化是学术研究中的新命题，引起的研究和关注较少。而在陆地边境特定区域的一些“抵边村落”^[1]客观存在一定程度的虚空状态，并且呈加剧的态势，有的“抵边村落”甚至全部搬离边界线。这种发生在陆地边境特定区域的虚空状态及虚空化态势要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要么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困扰而解决乏力。针对这一客观存在而又难以短期解决的边境问题，笔者在云南省 H 边境县某些“抵边村落”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了问题背后的生成逻辑。从认识问题或者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复杂的，需要综合各方（结构）的因素来加以全面分析，进而更加准确地把握和认识此类问题。

一、陆地边境虚空化的内涵及“抵边村落”虚空化的提出

边境虚空化是边境地区虚空的一种态势或过程，主要是指边境特定区域内的人口虚少、外流、流失的态势和过程。包括边境乡镇、村落的虚空化态势，特别是“抵边村落”的虚空化最为凸显。具体来看，边境虚空化并非内地一般区域的人口外流或

¹【收稿日期】：2018-04-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边疆整合研究”（17CZZ043）、云南省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资助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研究生项目“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摩梭人的政治权力研究”（2017YJS096）、云南大学第九届研究生科研创新重点项目“中越边境的虚空化及治理研究”（YDY17005）的阶段性和成果。

【作者简介】：王江成（1990-），男，云南罗平人，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大学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院兼职研究人员。研究方向：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乡村政治与基层治理。

²①“抵边村落”是陆地边境特定区域的村落形态，是指因村民抵达、紧挨或靠近边界线居住而形成的村落形态。在中国广大的陆地边境主要以“跨界村落”的形式出现，即因国界线穿过而出现的“一村两国”或“一寨两国”的现象。“抵边村落”概念的提出受到云南省 H 边境县某部门工作人员的启发，其在与笔者交流的过程中，提出邻国“抵边居住”的政策，因此，笔者把“抵边居住”的村落称为“抵边村落”，在此表示感谢。

流失等现象的概括，而是生发在边境场域的特殊人口流动现象，是关乎守边、固边、稳边的重要边境治理问题，会直接影响到边疆的安全、稳定与发展。因此，边境虚空化有着相比内地或一般区域虚空的特殊场景和特殊影响。对于这一特定对象的研究，笔者从发表在 CNKI 的文献中了解到，目前只有 1 篇学术论文直接关注到边境虚空化问题。该篇论文基于全球夜间灯光遥感数据选取不同时段来对比分析了中越、中老、中缅边境相应区域的人类活动及其变化态势。通过考察并发现：1992-2013 年期间，在边境乡镇尺度（10 公里纵深），我国西南边境虚空化现象呈持续加剧之势。而在边境县域尺度（50 公里纵深），我国西南边境虚空化情况则存在着波动。基于科学数据的分析，进一步说明了我国西南边境区域客观存在“虚空化”问题或者趋势。文中，作者提出“从充实边境和稳边固边的意义上说，我们可用边境虚空化来指称那些由于边境常住人口外流或迁离边境生活而出现的相对于邻国边境的虚空状态。边境虚空化的本质，是边境地区的人口在边疆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基于生计策略而对‘边境’这一传统生存生活空间的疏离或在认同上的偏移。”^[1]这就在科学研究中明确提出了“边境虚空化”这一学术命题，为研究者认识此类现象提出了新的研究领域和分析框架。

将“边境虚空化”作为一个学术命题提出并展开的研究凤毛麟角：一方面，与“边境治理”在边疆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研究范式中的尴尬地位有关，在更加宏观的研究架构中，边境治理的特殊性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鉴于此，有学者提出把边境治理从边疆治理研究中脱离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希冀引起更多学者对边境的关注^[2]；另一方面，直面边境的虚空化对于边境地方政府而言是一个较为敏感的话题。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边境虚空化研究一直难以有效产出。

但学界对问题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产生问题来源的现实环境是学者们的“理论土壤”，类似“虚空化”的相关讨论在其他场域早已展开。有学者把发生在一般农村、小城市的类似现象称为“空巢化”“空心化”或“过疏化”。如徐黎丽与杨丽云就认为“空巢不仅是村庄实体的空巢，也是村庄精神的空巢。”^[3]日本学者今井幸彦则指出：“因向城市激烈的人口移动，而导致人口减少而引发的种种问题。我们把人口减少地域的问题在相对于过密问题的意义上，称之为过疏问题。”^[4]上述两种提法或概念主要关注的是人口外流及流失现象，暂没有注意到“虚空化”在边境地区（主要是在国界线区域）的影响及其潜在的风险和隐患。但“空心化”“过疏化”等为我们认识边境虚空化提供了借鉴。

“抵边村落”作为陆地边境的特定区域，是陆地边境虚空化的重点区域。因守土护边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抵边村落”的虚空化在陆地边境虚空化中凸显出来。“抵边村落”虚空化是发生在“抵边村落”内部及周围的特殊人口流失、外流、搬迁等活动而造成的村落虚空甚至空无一人的状态及态势。“抵边村落”的虚空化在客观上使得守土护边的有生力量削弱或散失，造成对边界线的守护失去了边民屏障，自然过牧、砍伐等更为便利，甚至越境生活的现象成为可能，一条“流动的边界线”逐步向内移动，长此以往，“流动的边界线”与客观的边界线存在偏移，一旦发生边界纠纷，很容易陷入被动局面并将直接冲击国家利益。

二、云南省 H 边境县“抵边村落”虚空化的发展态势

云南省 H 边境县是中越边境的主要通道，边界两侧一定区域在地理环境、民族文化、经济发展等方面密切关联。同时，经历过战争与和平的洗礼，边界两侧边民的内心情绪较为复杂，两国在边境区域的发展政策和关注度存在差异，两国之间的跨界民族问题长期存在。基于特定的边境生态，H 边境县在陆地边境治理中特点明显。而 H 边境县域生发的虚空化态势一旦与上述因素结合在一起则会出现更为复杂的边境治理问题。

在 H 边境县一些自然环境恶劣、生存生活条件较差且缺乏自然屏障的“抵边村落”，由于边民外出谋生或迁离故土，出现了人烟稀少，土地闲置、抛荒或弃耕，甚至有我方边民私自将其耕地转送、转租给邻国边民耕种的现象。这些现象导致 H 边境县“抵边村落”虚空问题的出现。所谓“抵边村落”虚空问题，是指那些原本有边民居住的边境“抵边村落”区域，由于边民外流或内迁人而导致的人口活动频次减弱、少人或无人守护、边境“抵边村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乏力的虚空状态甚至无人状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类似的虚空状态从表面上看依然呈现出较实的画面，但隐藏在背后的逻辑正在悄然变化，这种虚空的状态呈现加剧的态势，因而，处于虚空化的过程之中。边境虚空有着复杂而深层的诱因，如果不正视和解决好这些诱因，边境

虚空状态有可能持续，并产生难以控制的边境安全问题，甚至影响到国家领土主权的捍卫，致使国家利益受损。

具体来看，在H边境县某跨界民族村落，中方一侧居住着17户人家（政府人员按户口登记是22户），而仅隔10米之宽的小溪对面居住着越方42户同源民族，它们相互往来且互为亲戚。越方一侧嫁入中国的越南籍妇女有6位，而中国一侧则没有妇女嫁出。据该村村民介绍，本村的边民进入越方村落，其当地政府力量（主要是“公安”）和民间较为欢迎，当然，越方边民进入中方一侧也较为容易。一是因为双方都持有边民证，二是同属一个民族的关系，彼此在文化、宗教、语言、习俗等方面较为熟悉，三是两个村落距离较近，没有较为复杂的隔离屏障，来往较为容易。这种每天多次出入两国的有趣现象在跨界民族村落的边民看来，似乎历史上他们就这样往来，国界线并没有切断边界两侧边民的日常联系。相反，因民族国家主权的确立和政策的差异而改变了分属两国的同源民族的生活。因此，拥有不同国籍的同一民族较容易对比彼此的生活条件、经济收入和国家保障等等，这种较容易对比的生活状态必然相互影响着。从边民的视角来看，它们只关注“经济账”，在调研的过程中，“我方一侧边民强调最多的就是对方的‘惠边政策’比我们好，比如越南边民每年人均补助1000元，读书、看病皆免费”。而我方一侧政府的政策补助相比则较少，不仅如此，经济发展方式较为单一。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壮劳力外出打工成为中方一侧边境村落较为普遍的常态。同时，外出打工或读书的年轻人，在求学求生存的奔波过后，很少会再回到村里参加村镇的建设。城市化与现代化就像一台大功率的“抽水机”，不仅抽走了边境村落的年轻人，还把整个农村的青年人都“抽走”了，这样的“水泵”作业较为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口流动的动态。正因为如此，农村的“空巢化”、小城市的“过疏化”边境的“虚空化”成为一种态势。而边境的“虚空化”则直接关系到边境守护主体虚空的问题，因此，如何把守边、固边、稳边落实到每一个边民成为当前加强边疆（边境）治理的重要内容。类似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引导和基层政权建设的卓有成效。

在H边境县另一山地村落，与越方村落陆路接壤。边界线两侧边民同属一个民族，且往来密切。边民跨界务工、跨界放牧、采伐等现象较为突出。因没有隔离带和铁丝网，同时，山林密布，交通不便，机械化程度较低，边界线管控的任务较重。对于类似村落的管控或治理，当地政府采取了一种搬离山林（实际是边界线），定居平地的做法（或许与当前的扶贫攻坚有关，为了全面脱贫，改变人居环境，选择更好的发展条件），亦有官方工作人员认为是考虑到山地村落可能遇到的自然灾害，比如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但无论如何，在H边境县的边界线一侧出现了这样的“空心村”，目前是空无一人。而边界线另一侧的越方则恰恰相反，从政府层面而言，他们鼓励内地的失业者、低收入者等等人群迁往边境、建设边境，并给予比起“内地”更为优越的发展条件，用优越的惠边政策鼓励各类群体“抵边居住”，实实在在践行用人守边、护边、固边。而差别化政策的生成更多是考虑两国各自的历史背景、国情、人口等做出的宏观安排，而边界线两侧的边民则是自然的，生活环境是局限的，立场可能是片面的，想法可能是短视的，容易受狭小的生活场域所束缚。在边民的视角里，一旦缺少国家力量的正确引导，他们的国家意识相对淡薄，短期的经济效益考量会使边民在守边、护边等过程中忽视了对领土、主权、边界的认识。“空心村”、虚空化在边民的视角里或许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但国家却因此而失去了护边、固边的有生力量，仅靠政府的力量很难挡住“过牧”等自然现象。因此，在边民生活的自然逻辑中，政府应该加大投入和引导，使自在的边民生活变得“自觉”起来。

三、H边境县“抵边村落”虚空化的生发逻辑

“抵边村落”的虚空问题及虚空化有着特定的生发环境和结构要素，需要综合多种因素加以考察。从问题产生的逻辑来看，政府机构、边民角色、社会结构、邻国生态等都是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因素。

边境县域范围内的基层政府（县级政府和乡镇政府）是直面“抵边村落”虚空化的重要主体，基层政府如何作为直接关系到边境治理的成效。在H边境县，基层政府的任务繁重，处理的日常事务相比内地一般政府更为繁琐，在解决一些边民重点关注的事项上较为谨慎。同时，面临的治理对象较为特殊，处理边民事务时常常需要国际视野。这样的治理环境对边境基层政府提出了更高的治理要求。但在实现边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边境地方政府缺少相应的或特殊的制度供给、人才支持、智力保障和最为重要的政策倾斜特别是财政政策的扶持。以H边境县出现的“空心村”为例，乡镇政府出于上级政府统筹安排的考量，坚决贯彻执行上级党委政府的意志，但在与边民互动的过程中，又会遇到预想不到的情况（边民与政府的利益博弈），而上级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缺乏对边民一线的了解，乡镇政府在类似“政策博弈”的过程中需要承担很大的风

险和责任。乡镇政府对边民最了解，但缺少处理特殊事务的特殊权限。为了避免风险和责任，只能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意志。而一旦边境政策发生偏差或政策失效，那么其所带来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或从长远来看将会直接牵涉国家利益。而任何一项政策的落地都需要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在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国家，某些政策的落实难免存在偏差，而基层政府“因地制宜”的空间往往是有限的。因此，本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创造力的边境基层政府在边境治理的过程中往往缺乏创造性，特别是缺少纠错机制，政策的调整周期也较长，虽是规模较小的基层政府，但灵活性还有待提高。这就使其在处理边境事务的过程中，效率不高。从笔者调研的结果来看，边境基层政府在看待边境安全、发展、稳定等问题时，常常能够切中要害，同时也有很高的工作积极性，但却缺少最大限度迸发边境基层政府能量的政策权限、人才配给和资金保障，这也是实现边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要直面的头等问题。

从H边境县的社会结构来看，H边境县居住着瑶、苗、壮等6个世居少数民族。瑶族作为H边境县的自治民族，在民族区域自治和少数民族干部政策实践过程中占有优势，苗、壮等少数民族也专门成立了民族乡。从某种程度而言，6个世居的少数民族在H边境县都获得了保障集体政治权利的体制机制。但从民族政治属性的角度来看，瑶族在H边境县体现得更为完整，换句话说，在H边境县，上级政府涉及政治等权益的各种安排都会优先考虑瑶族的诉求。这样的利益格局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H边境县的社会结构。在H边境县权威性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出现了“亲体制者”和“疏体制者”。“亲体制者”逐步抱团使得H边境县的政治生态缺少新鲜血液，向上流动的机制更为困难，这就为体制机制的“吐故纳新”增添了难度。同时，“蛋糕不变或鲜有增长”而“盘子却越来越大”，所谓的“亲体制者”内部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疏体制者”在难以改变既存关系结构的情况下，外出谋生成为了一种必然。人口过疏，劳动力流失，人才难栖为边境县域虚空化提供了现实的注脚。实际上，在边境村落也存在类似“体制机制”问题，村落集体资源匮乏，村落发展条件较差，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收入不高。造成村落青壮劳力基本外出打工，外出求学则再难返回。

从边民的视角来看，边民对民族或民族与国家的认识并不清晰，国家意识较为淡薄。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味地强调“民族”或者扩大“民族架构”^③的适用范围无疑是在刺激民族意识，而在国家意识没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只会“顾此失彼”。而如果把边民事务纳入到“边疆范畴”或“边境范畴”来考量的话，边疆是国家的边疆，边民事务只是单纯的边疆（边境）治理问题。那么，在“区域主义”^④的治理取向，兼顾国家的一般性和边疆的特殊性则可以更加有效地解决边境问题。事实也如此，在H边境县，边民最关心的是“钱袋子”，他们对邻国的汇率、邻国的廉价劳动力、如何过境做生意等了熟于心。从经济优先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开放和精明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们的政策出现误差（对民族意识的刺激）或引导出现偏差（缺少国家意识教育），一旦边民的“钱袋子”受到冲击，边民向外对比的意识就会比较强烈，在潜在的其他势力的影响下，相对简单的经济问题可能会被利用。吊诡的是，我们自己却在扩大这种被利用的可能，并一步步地强化各个群体的界限。殊不知“有界限就有差异，有差异就有对比，有对比就可能有问题”。在目前的社会管控下，边民在“钱袋子”无法得到有效满足的情况下，大多选择外出打工谋生，暂不会出现关乎边境安全、发展、稳定的其他问题。但目前把边疆（边境）问题等同于“边疆民族问题”的做法其实是为某些势力提供了生存的空间，正如H边境县某位政府工作人员所说“平静的湖水下面暗流涌动”。如要从根本上实现以人守边、护边、固边，我们的政策是需要调整的，在国家意识培育方面需要做更多工作，当然，发展经济依然是H边境县的首要问题。

从邻国生态的角度来看，H边境县边界两侧国家的心理状态有很大差异。小国重防御，大国则较开放，小国重细节，大国则较宏观。因此，缩小到边境场域，越方的“惠边政策”反而具有比较优势。比如他们以优越的政策和条件鼓励边民“抵边居住”，鼓励内地失业者、低收入者等其他弱势群体到边疆居住和生活，这些政策对我方一侧边民具有很大的经济诱惑。同时，大国事务繁多，传统上“重核心轻边缘”的思想轨迹依然可循，而小国则把与大国接壤和缓冲区作为防御的前沿，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加以建设，大国的“边缘”与小国的“前沿”在比较中缺少优势。但边境县域的边民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们只关注与他们经

^③①“民族架构”是有关民族问题的一整套结构，包括民族政策、民族工作、民族制度、民族话语、民族权利、民族观念等等。

^④②“区域主义”的治理取向是政治学家周平教授在“边疆政治学”学科范式中针对当前的边疆治理（陆疆治理）现代化而率先提出的治理取向或治理战略，它是相对于传统的“族际主义”而提出的新概念。意即以处理边疆区域性问题的治理。参见：周平. 陆疆治理：从“族际主义”转向“区域主义”[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6）.

济利益息息相关的切身问题，只关心他们的“钱袋子”。所以一旦政府缺少引导和宣传，边民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就容易片面化。在没有经济因素的刺激下，自然的“抵边居住”很难稳固，相反，在其他因素的作用下，边民纷纷选择离开边境一线（包括“抵边村落”）前往更好的地区（本国的核心区）谋生，自然也不排除去往邻国寻求机会。

四、陆地边境虚空化应该受到持续关注

事实上，陆地边境的虚空化不仅发生在云南省 H 边境县的一些“抵边村落”，在西藏自治区中印边境地区也客观存在。以玉麦乡为例，截止 2015 年该乡仅有 9 户 31 人，他们守护着中印边境的一方领土。这样的现象是不是一个问题可能会存在争论，但这样虚少的人口在宽广的陆地边境面前显得过于空虚。同时，不仅是陆疆，海疆上的偏远岛礁同样人烟稀少。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与边境（边疆）的地方条件（自然、交通、气候）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国家的区域发展失衡有关。正如上文所说，城市化、现代化就像一台大型的“水泵”把农村的人口向城市抽取、把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抽取，也把边境（边疆）人口向内地抽取。从城市化、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农村的“空巢化”、小城市的“过疏化”、边境的“虚空化”成为一种难以避免的现代化结果。它所带来的第一个压力就是农村劳动力的散失和大城市人口的拥挤或爆炸。对国家而言，城乡差距，东西差距将会不可避免地扩大，而对于边境（边疆）而言，将会散失守土护边的有生力量。而“中国是世界上接壤国家最多和陆地边境线最长的国家之一。自古至今，边民都是充实边境和守土卫疆的重要力量。”^[1]那么，如何在现代化乃至全球化的背景下有效地开展边境治理则成为当前解决边境虚空化特别是“抵边村落”虚空化的一个重要课题。而“抵边村落”的虚空化仅靠边境场域自身的力量则很难解决，更大程度上需要国家、政府、社会的持续关注并共同谋划。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从全球治理的视角出发，有必要将边境治理从边疆治理中分离，脱离原有边疆治理的民族问题研究框架，针对边境地区开放与安全的动态平衡作进一步研究。”^[2]此种观点看到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边境在整个国家治理以及边疆治理中将会凸显出来的特点，进而在边疆治理的基础上提出边境治理研究范式。从理论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种关注和提法与边疆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均质化程度有关，以国家核心区为中心向外拓展，边疆（宏观、中观、微观）是国家的边缘性部分，是异质性特点凸显的边缘性疆域。而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传统的边疆区域则会越来越均质化，边疆与内地的内部分界线将会向外推进，从边疆（宏观、中观）向边地看，边境的异质化将更为突显，对边境的治理也将会更加突出。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边境治理可以从边疆治理中脱离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这也符合边疆的动态性。但正是因为边疆的动态性，从“边疆场域”到“边境场域”的转换需要一个过程，毕竟全球化视阈下各地区的差异仍旧明显，边疆治理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但无论如何，基于现实边疆及外部环境（全球化、现代化等）变化做出的理论创新当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边境治理的研究视角下，边境虚空化作为边境治理的重要内容理应受到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在边境治理范式的推动下，对于边境虚空的防范和治理，已有学者做出专门的思考，并把边境虚空的治理纳入中国边境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中，“由于生存生活环境恶劣、经济发展迟滞和全球化因素的影响，我国的一些边境地区出现了人口外流或流失而导致的边境人口分布稀疏、边民活动频次减弱的边境虚空问题。这些问题，给边境地区的人口安全、领土主权安全、边防稳固和经济社会发展等都带来潜在隐患……必须在陆地边境治理中防范和治理边境虚空。”^[5]

从政府主体来看，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方面，农村的现代化并不代表所有的农村都要城市化，城市化是有一定限度的。实际上，乡村经济、边贸是可以繁荣发展的。另一方面，对于我国大城市人口和规模的无限制，有学者已经提出了如何规避中国城市化陷阱的一些看法，提倡中国城市的多中心化，认为我国的二三线城市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并提出了解决我国城市化所带来的诸如人才“孔雀东南飞”等问题的建设性意见^[6]。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边境地方政府职能、边境治理过程等都需要进行相应的转型与调整。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历史上或者民族国家时代的边缘与边境将会成为全球化时期大国走出去的“前沿”，边境地区在新的历史阶段将大有可为。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对边境县域问题的治理仅靠边境县域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以边境县级政府为主，落实主体责任，同时，实现上下联动（市、州，乡、镇）、纵横结合（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互为支撑，共同维护边境的安全、稳定与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促安全，以安全稳人心，从而实现边境区域的安居乐业。并在这种有效而严谨的制度机制和治理目标下，实现对包括边境虚空等问题在内的边境问题的系统应对与系统治理。

从国家崛起和巩固民族国家领土主权的角度来看，边境场域是守边、护边的第一线，边境的巩固和充实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领土主权不受侵犯。不仅如此，在国家崛起与“治国必须治边”的要求下，边疆（边境）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前所未有地突显出来。陆地边疆（包括边境）有望成为国家发展的新增长极。^[7]而边境县作为狭义的边疆县，在整个边疆（宏观、中观、微观）实现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是核心或重点区域，而“抵边村落”又是边境县中的第一线。边境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整个边疆实现全面小康或跨越式发展。对于边境县的发展与治理，国家层面的“兴边富民行动”已经实施多年，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效果，推动了边境县的快速发展。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边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在某些区域更是民族问题进而上升为政治问题。关键是如何看待和认识中国各个边境区域生发的问题及其性质，没有对问题的合理定位和分析，就可能出现对问题的扩大或轻视。从云南省 H 边境县的治理生态来看，该区域的治理问题基本上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从其边境虚空的特点和成因中可窥见一斑，至于民族问题则完全可以规避，关键是看治理主体采取何种治理政策和治理取向。相反，在中国某些民族问题比较突显的边境区域，如果仅把此类问题当成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来治理的话，则可能造成社会管控的失效，以至于出现安全、稳定甚至恐怖主义问题。因此，在国家层面应该制定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层面边境问题的治理策略，秉持“区域主义”的治理取向，解决各地区的区域性问题。

[参考文献]:

[1]白利友，谭立力. 基于全球夜间灯光遥感数据的中国西南边境虚空化考察[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

[2]刘雪莲，刘际昕. 全球治理视角下的边境治理研究[J]. 教学与研究，2017（2）.

[3]徐黎丽，杨丽云. 边疆山村空巢化原因及解决途径[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7（1）.

[4]今井幸彦. 日本的过疏地带[M]. 东京：岩波书店，1968：26.

[5]白利友. 中国的陆地边境治理及其研究[J]. 新视野，2017（5）.

[6]郑永年. 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M]. 上海：东方出版社，2014.

[7]周平. 国家崛起与边疆治理[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